

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述略

陈建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央的具体指导下,邓小平在西南民族地区扎实组织、规划、部署和实施了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工作,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论述,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以民族团结治国的主轴和脉络并与之一脉相承。也正是由于适合多民族国家国情的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我国的民族关系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几年内得到了迅速而显著的改善。

关键词:邓小平;民族工作;民族团结;西南民族地区;民族问题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8)06-0001-05

“中国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团结;民族间的、阶级间的、党派间的、国际间的。只有民主与团结,才能使抗战增强力量,才能使中国走上轨道。”^[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团结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制度建构的原则。发挥临时宪法功能的《共同纲领》在第50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族民族团结的行为。”^[2]周恩来在《共同纲领》的说明中就此指出:“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3]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4]。毛泽东在给西北局的指示中也明确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5]。

从少数民族的分布来看,“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6]①};“从几个大行政区来说,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地

区,另一个是西北。”^{[7]274}在中央的具体指导下,邓小平在西南民族地区扎实组织、规划、部署和实施了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工作,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邓小平对民族团结的高度重视

1949年以前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出多门、治乱循环的乱象一直存在且不绝如缕:“地土无不肥沃,出产无不丰饶,人民无不强悍聪颖,惟主官无治、自相残杀,以致人民稀少、稼穡不谙,道路梗塞,商旅不通,为可惜尔!”^[8]

早在进军西南之初,邓小平就针对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而特别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在提出“内部团结”、“依靠西南人民”和“统一战线”这“三个法宝”的同时,他特别强调通过制度建构来加强团结:“我们可以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联系群众,进行统战。凡使用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9]在对贵州工作的指示中,邓小平要求:“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级干部,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10]到1950年,邓小平又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就是说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遇有争执,也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获得解决”,“团结的

收稿日期:2018-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ZDA153)。

作者简介:陈建樾,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民族理论、族际政治。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工作》(1950年7月21日)。本文是邓小平关于西南民族工作的集中论述之一,下文凡出自此文

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11]。“无论城市农村,均须注意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迅速与各界见面,尽快地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地应认真地进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并注意总结经验,以求改进”^[12]。

正是考虑到“西南问题至为复杂”^[13]和少数民族对解放西南的巨大支持,邓小平在西南工作的部署中特别强调民族团结:“我们正本着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团结各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巩固国防。”^[14]

二、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主要内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邓小平的民族团结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十个方面。

1. 如今的中国“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抗战期间就逐渐形成了清醒的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考,这个认识和思考的核心就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总称:“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5]在西南工作中,邓小平清晰而明确地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高度考虑西南的民族问题,多次强调统一多民族的国情:“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也不是少数人守望国家,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国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16]具体到西南地区,邓小平指出:“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

2. “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境地区,因此边疆稳定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就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必须对帝国主义及反动残余的阴谋引起高度的警惕,用最大努力加强国防建设,特别是注意边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工作,以巩固西南国防。”^[17]³³²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归纳总结了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相互关系:“西南

国防与各民族团结是不能分开的,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7]²⁷⁴⁻²⁷⁵

3. “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邓小平,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并付诸西南工作的实践当中:“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

4.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在邓小平看来,民族团结是“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也正因为“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极端重要”,因此邓小平在西南民族工作的部署和规划中,要求“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因此“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

5. “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是抛弃大汉族主义”。大民族对小民族的歧视与不平等,是民族隔阂的根源。因此,“团结少数民族的关键是抛弃大汉族主义。我们抛弃了大汉族主义,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纲领是正确的,但是少数民族重视的是事实,如果只讲不做,他们就会怀疑和反对我们。所以,对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各项决议,我们的责任是坚决实行”。“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要求少数民族首先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取消大汉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邓小平在讲话中甚至以身作则地讲:“我是一个汉人,应该努力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汉族干部的责任;各少数民族干部,应该努力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两方面去做工作就能达到团结目的。”^[7]²⁷⁷⁻²⁷⁸

6. 民族区域自治是“团结的最好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核心,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自治区域以实行不同于其它行政地方的社会政治制度,让少数民族通过自治机关行使

自治权并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让少数民族通过行使自治权实现政治参与和当家作主,共享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各项利益和成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和具体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就此指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成立联合政府。不这样做就是错误,就不能增强民族团结”^{[7]278}。“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少数民族,我们还决定了两条。即:一,广泛运用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去团结教育和争取少数民族,调节民族间的纠纷。二,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人民政府两级设专署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委员会,以便容纳各少数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到政府中来,并参加政府中的具体工作,这样才能充实民族联合政府的内容”^[18]。“要加强西南人民内部团结,尤其应该着重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更认真地建立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族联合形式的人民政府,更认真地从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帮助各少数民族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7]336}。“少数民族的事应当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这是不行的。”

7. “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在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实行既保证统一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因此必须在制度安排上深刻认识到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少数民族充分享受相应的权利和利益。邓小平在西南工作中,特别重视从经济发展角度推进民族团结。“经济问题是各族人民的一个基本问题”^{[7]280}，“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我们一方面要从政治上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而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没有这一点,爱国主义是巩固不起来的。”邓小平早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有鉴于此,邓小平特别要求“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资源富集地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与内地的经贸关系中,民族地区经常性地成为初级产品的输出地和制成品的输入

地,因而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的经贸利益关系,不仅是简单的市场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事关民族团结的政治问题。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配给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邓小平就从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强调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与此同时,邓小平也以税收政策为例,指出民族政策并不是无限期地执行下去:“税收方面,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应该少于汉族,因为少数民族要贫瘠些。但将来经济发展以后,经济条件一致时,各民族的负担就该一样了。”^{[7]282}

8. 在民族工作中“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民族工作涉及到民族地区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与少数民族商量,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因地制宜,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就是不搞一刀切,不搞简单粗暴:“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指出,“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9. 干部“要懂民族政策”,要带动少数民族加快发展,并“严防‘左’的偏向”。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派往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干部要能够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就必须使各族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提醒在民族工作中要严防“左”的偏向:“带队的人必须

紧靠着队伍,一方面带着群众向前走,一方面又不能脱离群众,如果你走了两百里,队伍才走一百里,那就一定是脱离群众。”^{[7]281}因此,“民族工作一定要慎重,不然好的愿望会变成坏的结果”;“首先必须着眼于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谨慎地决定政策,严防‘左’的偏向”。

10.“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情况和历史积淀下来的历史积怨、隔阂和裂痕,必须在民族工作中坚持深入、扎实、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这就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

基于上述全方位的思考,1953年,邓小平在政务院188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是经济”,“自治权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财政。……假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后,群众生活还不能改善,他们即会怀疑区域自治到底有什么好处?”^[19]

邓小平同志关于西南民族工作的观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西南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考。这些观点虽然话语平实简朴,但却渗透着多民族国家统一性和民族多元性的深刻认识,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具体贯彻和有针对性的创新发展。

三、结语

邓小平关于“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

结”的论述和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一思想脉络上的地方经验和工作部署。这一可以概括为“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的民族工作思想,是建构在清晰的国族建构和明晰的民族认知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20]。

习近平同志指出:“理论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21]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演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运用历史智慧”和“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思想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民族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从民族团结取得抗战胜利到民族团结建立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和理论建构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纳为“以多民族国情认知为核心、以制度和法治坚持为要义、以干部和政策的为进路”这三个值得继续坚持、坚守和完善、发展的面向。

综观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在西南关于民族团结的论述,可以发现其思考都始终在党和国家以民族团结治国的主轴和脉络上并与之一脉相承。也正是由于适合多民族国家国情的民族团结思想及其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我国的民族关系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几年内得到了迅速而显著的改善,这不仅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力求使少数民族逐渐步入中国社会的主流。他们要进行根本的转变,但在速度和方式上都要照顾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实行这些政策后,共产党成功地使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归附于中央控制之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比以前任何一个主权都赢得了更坚实的立足点。”^[22]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的民族工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和具体实践,值得加以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944年7月7日)[M]//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56.
-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通过)[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2.
- [3] 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年9月22日)

[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

- [4] 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给二野前委指示(1949年10月5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4.

- [5] 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1949年11月14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9.
- [6]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94.
- [7] 邓小平.各民族共同努力把西南建设好(1950年11月28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8] 夏瑚.怒俅边隘详情(1908)[M]//政协怒江文史资料委员会.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上).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122.
- [9] 邓小平.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1949年9月20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7.
- [10] 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31.
- [11] 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1950年1月29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84-85.
- [12]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91,96.
- [13] 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2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44.
- [14] 邓小平.西南工作情况(1950年4月11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27.
- [1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1-622.
- [16] 邓小平.加强民族团结,改善人民生活(1952年3月5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496.
- [17] 邓小平.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1951年1月25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18] 邓小平.谨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1950年11月7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70-271.
- [19] 邓小平.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是经济(1953年9月3日)[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04.
- [20] 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21年)[M]//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3.
- [21] 习近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013年3月1日)[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3.
- [22] 弗雷德里克·C·戴维斯.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M]//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11-113.

(责任编辑 马旭)